

论《苍颉篇》的汉字传承价值

祝永新¹ 路炜²

1. 湖北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; 2.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

摘要:《苍颉篇》是秦代推行“书同文”的法定国家文字教材,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蒙学识字课本,其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枢纽性的传承价值。首先,该书作为“书同文”运动的成果载体,以法定范本形式保存并传承了秦代规范的小篆体系与“正字”标准,为后世汉字书写规范奠定了基础;其次,它开创“以类相从”的义类编排雏形,深刻影响了《急就篇》《说文解字》等后世字书的编排体例,完成了从无序罗列到系统分类的范式革新,是中国字书编纂传统的关键源头;最后,作为权威的文化工具,它通过官学体系与边疆传播,将规范汉字推广至广阔地域。而该书从亡佚到借简牍重光的历程,更象征了汉字传承的顽强韧性。

关键词: 苍颉篇; 汉字传承; 书同文; 以类相从; 文化认同

DOI: 10.65976/3105-4838.2026.03.025

《苍颉篇》成书于秦统一之初,由丞相李斯《苍颉》七章、车府令赵高《爰历》六章及太史令胡毋敬《博学》七章编纂而成,是秦王朝为推行“书同文”政策而颁布的法定国家文字教材。两汉以后,因文辞古奥、难习难传,该书渐趋湮没,终在唐宋之际亡佚,后世仅能从传世古籍所引佚文中窥其鳞爪。自20世纪初以来,随着敦煌汉简、居延汉简、阜阳双古堆汉简、水泉子汉简、北大汉简等多批简牍的相继出土,使这部久佚的早期蒙学经典得以重见天日。迄今出土字数累计近四千,不重复字数约占原书篇幅三分之二,为该书及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一手文献基础。

长久以来,学界对《苍颉篇》的研究集中于文字考释、文本复原、音韵训诂及编撰体例等领域,成果丰硕。然而,从宏观汉字发展史视角,系统审视其对于汉字体系传承与发展的独特价值,尚有深入开掘的空间。事实上,《苍颉篇》并非一部孤立的蒙学识字书,它是秦“书同文”运动的直接产物与执行工具,上承《史籀篇》,下启《急就篇》《说文解字》,在汉字形体的统一、字书编纂原则的创建、汉字文化的传播等层面,均发挥着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。本文拟以出土汉简《苍颉篇》为核心材料,结合传世文献,从三个维度论述其不可替代的汉字传承价值。

一、法定范本与文字统一:《苍颉篇》对秦代规范汉字的直接传承

《苍颉篇》最根本的传承价值,在于其作为“书同文”运动的法定教科书,直接保存并传承了秦代统

一规范的汉字体系,为汉字发展史提供了关键的时代断面与标准样本。

(一) 承载“书同文”国策,传承秦篆正体

秦始皇兼并六国后,“文字异形”成为施政障碍,遂有“书同文”之诏。李斯等三人奉诏编撰字书,其核心目的即是确立国家文字标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与《说文解字·叙》均明载,三篇字书“文字多取《史籀篇》,而篆体复颇异,所谓秦篆者也”,即以秦小篆为规范字体。关于这一问题,有学者通过比较玉门花海《苍颉篇》习字简与同批文书的字体,提供相关实证:花海《苍颉篇》简中“谨”字左边“言”部用笔曲弧,结构保留篆书写法较多,而同批文书中的“谨”字“言”部已简化,用笔方直,更具隶书形态;又如“会”字,玉门花海《苍颉篇》简形体修长,下部“口”用笔曲弧,篆意明显,而同批文书中的“会”字形体趋于扁平,隶意较浓。据此看来,早期《苍颉篇》材料的篆书特征显著强于同时期文献,推断古本《苍颉篇》应当是一部篆体风格浓郁的书,因其作为“文字教材”的性质,转写时要求尽量保留原字形特点。这证实了《苍颉篇》不仅是文字内容的汇编,更是“书同文”法定标准字形的载体^[1]。它以教材形式,将经过省改的小篆从朝廷推向全国,完成了从政策到实践的转化,使秦篆正体得以通过教学传承并广泛固定下来。

(二) 提供“正字”标准,延续汉字书写规范

《苍颉篇》作为国家颁行的识字课本,具有强烈的“正字”功能。它所收的文字,是经过甄选、符合

基金项目: 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“综合出土本和传世辑本的《苍颉篇》整理研究”(22YJC870023);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“水泉子汉简《苍颉篇》集释”(24D065);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后期资助项目“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医籍文字研究”(HBSKJJ20253336)资助。

秦制规范的“正字”。汉代虽陆续出现自编识字书，但《苍颉篇》的权威地位依然稳固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，汉代不少新编字书，如史游《急就篇》、李长《元尚篇》，皆“《苍颉》中正字也”，即是对其正字标准的继承与沿用。林素清在研究中指出，汉代一系列增补《苍颉篇》的作品以及仿作，皆具有“正字”功能，旨在纠正文字使用的紊乱。这表明《苍颉篇》确立的用字规范，在汉代乃至更长时间内，持续发挥着辨正讹误、统一书写的基准作用，是汉字传承中“规范性”力量的早期体现^[2]。事实上，《苍颉篇》对秦方言词的选用（如“楣、榱”而非六国常用的“簷、栝”“椽、档”），以及秦《更名诏书》禁用沅州方言“论”而改用秦方言“漫”，都体现了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”的“尊秦贬外”取向，这种对官方用字的强调，正是“正字”功能的政治化延伸。

（三）选字的时代性与日常性，反映汉字实用传承

作为蒙学教材，《苍颉篇》的收字必须适应学童认知与生活需要，因而多取当时常用字。通检《苍颉篇》文本，可见其选字涵盖了自然与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可从中了解秦汉时期的常用词面貌。例如，出土简文中涉及疾病分类的“癰癰痲瘞”、植物名称的“葵菲葱韭”，建筑水利的“陂池沟洫”“江汉沧汾”等，皆为生活常用词。这种选字原则，使得《苍颉篇》传承的汉字体系具有高度的实用性，确保了文字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衔接，避免了汉字传承成为脱离实际的学术活动，保障了汉字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生命力。可以说，《苍颉篇》收字范围涉及天文、地理、人文、生产生活诸多方面，为我们了解秦汉时期的文字体系提供了直接证据，其内容本身就是时代常用字词的活化石。

二、体例开创与源流枢纽：《苍颉篇》对后世字书编纂体系的深刻塑造

《苍颉篇》的传承价值，更深刻地体现在其对后世字书编纂体例与原则的深远影响上。它开启了从简单罗列到系统编排的进程，是连接《史籀篇》模式与《说文解字》模式的关键一环。

（一）以类相从：从义类编排到部首原则的先声

《苍颉篇》的文本编排，初步体现了“以类相从”的归类意识。胡平生先生在《〈苍颉篇〉的初步研究》中精辟地指出，从《苍颉篇》到《急就篇》，再到《说文解字》，可以清楚看出“部首”这一中国文字学最重要原则的发生、发展、成熟过程。并且强调，在《苍颉篇》残简里，以“黑”字为偏旁的字集中排在一起的就有十一个，几占《说文》从黑之字的三分之一，

俨然是个小“黑部”。这虽非自觉的部首分类，但已蕴含了按字形偏旁聚类的思想，是后世部首系统的萌芽。这种“以类相从”不仅是字形的聚合，也包含字义的关联^[3]。考察北大汉简《苍颉篇·汉兼》章，其中的颂辞“飭端修法，变大制裁，男女蕃殖，六畜逐字”被编联在前，而贬抑色彩的“傲悍骄倨，诛罚资耐，丹胜误乱”被编联在后，体现了按语用地位、褒贬色彩分类的思想，这也是一种深刻的义类编排逻辑。

（二）对《急就篇》的直接启发：义类聚合原则的明确化

《急就篇》明确提出“罗列诸物名姓字，分别部居不杂厕”的编集方针，这是对“以类相从”原则的明确表述。例如“铁鈇钻锥釜鍍鍪，锻铸铅锡鍱鍪”等句，罗列了32个以金为部首的字，“襜褕袷褶袴裌”等句，罗列了19个以衣为部首的字。这种同义类同部首的字词集中编联，显然与《苍颉篇》中“小黑部”式的编联相同，是此类体例的传承。但这种传承又有所进步，其收字数量更大，字位序列更加紧密，体现出更强的义类聚合原则，可以说，这种原则经过《苍颉篇》的启发，直至《急就篇》时，已经更加自觉而系统，变得明确化了。《急就篇》许多词句亦与《苍颉篇》相似，如“勉力务之必有喜”即套用自《苍颉篇》。这证明《急就篇》在内容与体例上均直接继承了《苍颉篇》的遗产^[4]。

（三）对《说文解字》的奠基：从聚合到系统的飞跃

许慎编撰《说文解字》，提出了“其建首也，立一为端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同牵条属，共理相贯，杂而不越，据形系联”的部首原则，标志着汉字编排体系的成熟。这一伟大创举，正是建立在《苍颉篇》与《急就篇》所奠定的“以类相从”基础之上。例如《说文解字》中部分字序仍与《苍颉篇》相同或相近，如“综综、医量、继续、絮聚、痕瘡、桥梁、镶铬”等。而如《苍颉篇》中相邻的“赏赐”“机杼”“蓬蒿”“痕瘡”“讽诵”“表里”“招摇”“玫瑰”“桎梏”等，在《说文解字》中亦多为相邻编排。

《苍颉篇》中形类聚合的编排实践，直接启发了《说文解字》按偏旁系联字群的部首原则。《苍颉篇》虽未建立严密的部首体系，但已大量出现将同偏旁字集中排列的情况，例如上文提到的“小黑部”就是如此。这些黑部字全部收录于《说文解字》黑部之中，且字序不远。这一语例清晰展示了从《苍颉篇》的“形类局部聚合”到《说文解字》的“部首系统统摄”的演进轨迹。《苍颉篇》中这种将相同偏旁字类聚编排

的尝试,实质上是“据形系联”思想的萌芽,许慎正是总结了《苍颉篇》等字书在编排上的这类零散经验,最终将其升华、成熟为严密的五百四十部首体系。

可见,《苍颉篇》不仅提供了“聚类”的思想资源,其部分文本的实际排列顺序,也可能被《说文》所借鉴。因此,《苍颉篇》是中国字书编纂史中从萌芽走向成熟不可或缺的过渡环节。

(四)版本流变的见证:从“秦三苍”到“汉改编本”的传承与调适

《苍颉篇》的版本流变本身,也体现了汉字传承中“守正”与“应变”的辩证统一。以出土《苍颉篇》为依据,结合传世文献对《苍颉篇》的记载,可知《苍颉篇》经历了比较复杂,但传承性较强的版本流变。《苍颉篇》在秦代成书之初本为三篇,李斯《苍颉》七章,赵高《爰历》六章,胡毋敬《博学》七章,为四言本,分别授行。汉初,汉人将三篇合一,以李斯《苍颉》七章为首,遂统称《苍颉篇》,此亦该书得名之由。其后,汉代间里书师将《苍颉篇》重新分章为55章,便于教学。至西汉晚期,又出现了七言增字本,即水泉子汉简《苍颉篇》所见的七言本,在四言基础上增加三字释义,句句押韵。这些不同版本,反映了为适应不同时代教学需要而对文本形式进行的调整,但核心内容与“正字”规范一脉相承,体现了汉字传承中的灵活性与稳定性^[5]。

三、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:《苍颉篇》在汉字文化圈内的传播影响

《苍颉篇》的价值超越了一部字书本身,它作为官方文化工具,在传播规范汉字、构建文化认同方面发挥了深远影响,这是其汉字传承价值的升华。

(一)作为官学教材与仕途阶梯,广泛传播规范汉字

《苍颉篇》是汉代官吏选拔与晋升的必读教材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汉官仪》:“能通《苍颉》《史篇》,补兰台令史,满岁补尚书令史,满岁为尚书郎。”这意味着精通该书是入仕的阶梯。同时,汉代边塞吏卒也以该书习字。分析居延、敦煌等边塞遗址发掘出的汉简《苍颉篇》,可知这些简牍是为了便于边塞地区的书吏官员们临摹正规字体、运笔习字使用。其原因何在?因塞上吏员缺乏,多于士卒能识书习字者中培养擢选,故烽燧遗址中经常出土《苍颉》《急就》等小学书以及吏士们练写的杂书简。这证明《苍颉篇》的规范汉字,通过国家教育与吏职考核体系,深入到官僚阶层与基层社会,实现了大规模、制度化的传播。

(二)出土于边疆与西域,实证汉字文化的认同拓展

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的《苍颉篇》残简,为考察其汉字传播价值提供了最富意义的边疆实证。该遗址属汉代精绝国故地,在此发现中原蒙学课本,确证了当时西域地区已将《苍颉篇》作为习读汉字的正规教材。这一事实表明,规范汉字的传承版图早已跨越中地理疆界,辐射至广袤的西域地区。以国家法定识字课本为载体,汉字体系及其背后的典章制度、伦理观念随之输出,这实质上是中原王朝文化软实力在边疆地区的深层构建。相较于军事与政治的统辖,以《苍颉篇》为代表的汉字教育传播更具持久性与渗透力,它使边疆精英阶层在习得文字的同时,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汉文化的价值体系,对于中华早期文化圈的拓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,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(三)作为识字课本与书法范本的双重性质

在传承实践中,《苍颉篇》兼具识字课本与书法范本的双重属性,这不仅扩展了其传承维度,更强化了汉字符号的完整性。作为习字教材,其功能绝不仅限于辨识字音字义,更在于为学童提供运笔结体的标准范式。观察出土的北大简等早期抄本,其书法呈现出鲜明的规范特征:用笔上规避随意的提按与波磔,整体匀称严谨;构形上对相同偏旁部首的处理力求整齐划一,以降低初学难度;字形结构则保留诸多古文字特征,显现出“字法较古”的守正倾向。这种书写上的刻意规范,使《苍颉篇》在实际上履行了“法帖”的功能。因此,它在传承汉字形音义的同时,也将官方的书写规范与审美传统一并传递,确保了汉字不仅在认知层面被识别,更在书写层面被准确复现,从而实现了汉字作为一套完整文化符号的立体传承。

(四)亡佚与重光:汉字传承韧性的象征

《苍颉篇》大约在宋元时期彻底亡佚,但其文本却以残片的形式散落各地,埋藏于流沙烽燧、王侯墓葬之中,历千载而重见天日。从清代孙星衍等人的辑佚,到今日诸多简牍校本,学者孜孜以求,努力复原其原貌。这一过程本身,极具象征意义:它表明,汉字及其承载的文化体系,具有惊人的韧性与生命力。即便载体湮灭,其核心仍会以碎片化、物质化的方式存续,并借助新的考古发现与学术努力得以重生。《苍颉篇》的这段“亡佚—重光”史,正是中华文明与文字传承史的一个生动缩影。

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,《苍颉篇》的汉字传承价值是多维度

且具有枢纽性的。它首先是“书同文”运动的直接成果，以法定教材的形式保存并传承了秦代规范的小篆体系与“正字”标准，奠定了后世汉字书写规范的基础。其次，它在字书编纂史上承前启后，其“以类相从”的编排体例对《急就篇》《说文解字》的后世字书造成深刻影响，开创了字书字词编纂从无序罗列到系统分类的范式革命。再次，它作为权威文化工具，通过官学体系、仕途阶梯与边疆传播，将规范汉字推广至广阔地域，参与构建了超越政治疆域的文化认同。而其从亡佚到借简牍重现的命运，更象征着汉字传承的顽强韧性。所以，《苍颉篇》的传承价值研究，对于理解汉字体系的统一过程、字书编纂的源流演变以及汉字文化的

凝聚力，均具有重要意义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祝永新, 杨怀源. 秦“书同文”字体标准、篆隶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——以出土秦汉文献为中心 [J]. 中国文字研究, 2021(01):136-145.
- [2] 林素清. 《苍颉篇》研究 [J]. 汉学研究, 1987, 5, (1).
- [3] 胡平生, 韩自强. 《苍颉篇》的初步研究 [J]. 文物, 1983(02):35-40.
- [4] 张存良. 水泉子汉简七言本《苍颉篇》蠡测 [J]. 出土文献研究, 第9辑, 中华书局, 2010.
- [5] 朱凤瀚.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(壹)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5.